

新版 · 敦煌新本

# 六祖壇經

楊曾文 / 校寫



宗教文化出版社

新版 · 敦煌新本

# 六祖壇經

楊曾文 / 校寫



新版 敦煌新本



楊曾文

校寫

宗教文化出版社

六 祖 壇 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楊曾文校寫。—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5

ISBN 7-80123-357-3

I. 六… II. 楊… III. 佛經-研究 IV. 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19533 號

**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楊曾文 校寫

---

**出版發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條 32 號 (100007)

**電 話:** 64023355-2503,2603

**責任編輯:** 張越宏

**印 刷:** 北京鑫洪源印刷廠

**版權專有 不得翻印**

**版本記錄:**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1.5 印張 255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3000

**書 號:** ISBN 7-80123-357-3/K·104

**定 價:** 22.00

---

南宗頓教宗上大宋庫訶波若波羅蜜經總志能大師於

州大梵寺施法懺經一卷兼受無相

大和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庫訶般若波羅蜜法受元  
相戒其時座下僧居士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連霞及諸官寮三十餘  
人德士餘人同請大師說庫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  
集記該行後代為學道者承此宗旨相傳受有所依均以為高宗  
元武原採能大師法要知兼淨心念庫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

敦博本《六祖書壇經》書影一

依此經行即得此證  
 志願合曰我此路確八箇餘月未至  
 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屏下見此偈禮拜亦悲願取結未盡  
 生仙地童子引能至南屏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  
 念能讀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醉書人於西  
 不題者至日本心不識本心奉法無益誠心見性即吾大意  
 又偈曰  
 菩提本无樹 明鏡亦无臺 性常清淨 何家有塵  
 又偈曰  
 菩提本无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亦清淨 何家染塵埃  
 隨肉徒來見能作此偈盡性惠能却入雁跡

## 新版前言

楊曾文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此後又曾再印，然而早在前幾年此書已經脫銷。國內外朋友希望我向出版社提議再印，以滿足參考需要。經與出版社聯系得知，他們因忙于新的出版任務，近期難以安排再印。在此書出版合同即將到期之際，承蒙出版社方面的好意，同意我收回版權請別的出版社出版。經與宗教文化出版社方面聯系，該社領導以最快的速度給予答復，決定近期安排再版此書，令人感動。

本書分三部分：正編是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一是惠昕本《壇經》之一的大乘寺本《壇經》及其他有關慧能、早期禪宗的資料；附編二是筆者的研究論文。

敦煌本《六祖壇經》寫本除最早發現的斯坦因本、本書發表的敦博本（敦煌縣博物館——現為敦煌市博物館收藏本）之外，近年又有新的發現。其中有：

1. 陳垣早已發現而長期未被學術界注意的國家圖書館本（簡稱北京本）；
2. 曾被日本人掠取放置旅順博物館（曾稱所謂「關東廳博物館」）而現已下落不明的敦煌本《壇經》首尾二枚照片；

3. 從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僅有七十七字的(有)字七九號殘片。

任繼愈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一冊收有敦煌本、敦博本照片；周紹良編著，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書前收載上述所有敦煌寫本的照片，為讀者參考提供了方便。

這些現存抄本雖全殘多寡不同，但可斷定它們皆源自同一類型《壇經》，在內容字句上沒有大的差異，可以互作校勘。

這次新版從整體上仍保留原貌，但又據上述各種敦煌寫本《壇經》對原書重作校勘，並對書中其它部分的個別字句、標點作了修正。

本書新版得到宗教文化出版社領導的支持，副總編戴晨京博士、張越宏女士承擔本書再版的繁重編輯工作，謹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南方莊公寓



## 序

周紹良

《壇經》是佛教禪宗的一部重要典籍，過去由於人們認為這部書經過一些人增損，文字鄙俚繁雜（即簡《壇經序》），是需要訂正的，也有人自己承認為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於是加以釐定，加以分卷（沙門惠昕《壇經序》），於是繁簡真偽之爭，至今未得定論。這是人所共知的。

自從敦煌石窟發現秘藏，曾出一鈔本（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於是學界公認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鈔本，它應該比較接近曹溪原本。經過相互比勘，的確是與傳世諸本如沙門惠昕序本（六祖壇經）、釋契嵩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釋宗寶跋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是有很重要的出入，但是也有人認為敦煌石窟所發現這個本子是節略本。

我個人看法，敦煌石窟所發現的這本《壇經》還是應該承認是一部最早的鈔本，從時間論，雖然很難確認它是唐代鈔本，但至少不會晚于五代時期至宋初。因為它已經不是卷子鈔本，而是用方冊式樣的冊子鈔寫的。因為佛教典籍，一直到宋代初年刻《開寶藏》時還保存卷子形式，即使在

民間或者已早有方册本流行，恐怕難以上推到唐代。並且從鈔寫形式論，敦煌經生一直是用卷子鈔寫經籍，中原地區更未見有以方册形式鈔寫佛教典籍的記載或實物。所以個人考慮，這本《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或許還是粵越僧人的書籍，這是當時南方流行的形式，由他們從廣東地方携來敦煌，時代或在宋初？如果這一推斷可以成立，那麼這個本子肯定錄自曹溪，出自原本的。

現在這個本子原件保存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壇經》者大都輾轉依賴照片或過錄本進行工作。從照片看到，原鈔本甚為草率，似非深于禪學者所錄，因之中間錯落衍誤，舉目皆是。像這樣的鈔本，居然不遠萬里，被帶到敦煌。推其原故，大概禪宗修持，不立文字，所以對祖師垂訓，祇是隨便請人鈔錄一份，以供參悟，鈔手也就草率從事，並不忠實謄寫。大概類似這種本子很多，以致後來研讀《壇經》的人，感到文字鄙俚繁雜，遂各自加工整理，形成各式各樣的定本。

由於《壇經》版本甚多，過去曾有意彙集成編，以便學者共同研究。同時，於《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載「旅順博物館所存敦煌之佛教經典」中查出該館藏有《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一目，知該館也藏有鈔本《壇經》。偶與向達先生談及，承其見告，過去初至敦煌時，曾於當地收藏家任子宜處得見所藏《壇經》，形制與倫敦本極相似，不但鈔寫工整，而且文字少誤。當時曾假歸錄副，後來返回重慶，偶與呂澂先生談及；呂先生乞去，不得已贈之。二次再至敦煌，重

新向任子宜借錄一過，列入《敦煌雜錄》（未出版）。可惜原書已不知散在何處云云。因舉所過錄本相示，展讀之下，確比倫敦藏本完整少誤。後來函致旅順博物館追蹤所藏一本。得覆云早已逸失，無從尋覓。又復多方探詢任藏《壇經》，亦迄無消息。

一九八六年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承邀赴敦煌訪問，在參觀敦煌縣博物館時，于展櫃中赫然陳列一本《壇經》，因請主事者提出細檢，則任子宜舊藏本也。大喜過望。歸來後因請古文獻研究室鄧文寬同志專程再去敦煌，蒙博物館當局慨允借拍。旬日携返，細加檢視，並出倫敦藏本照片對勘，其錯落衍誤者，大多得以補正。過去研究者據倫敦藏本加以臆測、考證、訂補之處，得此本而霍然，毋庸費辭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擬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因舉所得前述照片列入其中。然而此書之印，看來遥遥無期。楊曾文同志將其校本與日本發現之大乘寺藏《韶州曹溪山六祖壇經》彙印為一冊，以公於世人。我想這對研究《壇經》是極為有用的。他還將他所研究《壇經》諸本演變之探討文字附之於後，這更有便於學者之參考。楊曾文同志認為任子宜保存之功與向達先生發現此本之功皆不可沒，囑述其經過，以誌老一輩對於學術之貢獻。謹記其原委與個人認識於此。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 自序

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繼形成，標誌着佛教民族化歷程的基本結束，此後進入中國民族佛教的持續和發展的新時期。

在這些佛教宗派中，以禪宗的民族特色尤為突出，它在唐末五代迅速傳播，勢力和影響遠遠超越於其他宗派之上。

禪宗雖尊奉北魏時來華的印度禪僧菩提達摩為初祖，但從現存資料考察，禪宗的真正創始人應是被奉為四祖的道信（五八〇—六五一）和五祖弘忍（六〇一—六七五）。他們在蘄州黃梅（在今湖北省）的雙峰山和馮茂山（東山）傳法，弟子達五百人以上，所謂「東山法門」禪法已遠近聞名。弘忍死後，禪宗分裂為南北二宗。北宗以弘忍的弟子神秀（？—七〇六）為代表，主要傳播于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其禪法基本繼承道信、弘忍的傳統，主張坐禪修心，通過漸進的修行程序達到精神解脫。南宗以弘忍的另一個弟子慧能（或寫作「惠能」，六三八—七一三）為代表，開始僅流傳在南方部分地區，主張寄坐禪於日常生活之中，反對固守特定的修行方法和程序，強調自己「識心見性」，頓悟成佛。慧能的南宗禪法經其弟子神會（六八四—七五八）的大力

宣傳，特別在「安史之亂」後由于唐朝廷的有力支持，逐漸風行全國，成為禪宗主流，如柳宗元《賜謚大鑿禪師碑》所說：「凡言禪皆本曹溪。」此後的禪宗，實際祇是慧能的南宗。因此學術界也有人以慧能為禪宗真正的創始人。

慧能被禪宗奉為直承弘忍之後的六祖，記載他的生平事迹和語錄的《六祖壇經》是禪宗傳教和教授禪法的主要依據。慧能死後，弟子們到各地傳授南宗禪法，逐漸形成了傳承世系和禪法風格各異的許多禪派。神會的一支稱荷澤宗，在神會死後不久便衰微。慧能的另兩個弟子青原行思（？—七四〇）和南岳懷讓（六七七—七四四）分別在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市東南）、南岳（在今湖南衡山縣）傳法，門下弟子很多。行思門下有希遷（七〇〇—七九一），後來形成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馬祖道一（七〇九—七八八），後來形成臨濟宗、潯仰宗。以上史稱禪門五家。禪宗儘管形成這樣多派別，各派又有自家獨特的禪法和傳法方式，但實際皆以《六祖壇經》為基本依據。元代禪僧德異明確地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鐘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壇經序》）

《六祖壇經》在禪宗中是如此重要，但它絕不是一次形成的，也不是祇有一個本子。元代宗寶曾改編過《壇經》，學術界一般稱此種《壇經》為宗寶本。明版《大藏經》所收的《壇經》即為宗寶本。此後，社會上最流行的《壇經》就是宗寶本，其他各種本子的《壇經》逐漸佚失。一九二三年日本學

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書中發現了手寫本《六祖壇經》，一九二八年校寫後收編到《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第四十八卷之中。學術界稱此為敦煌本《壇經》。敦煌本當抄寫于唐末至宋初，篇幅比通行的宗寶本少得多，不分章節，言語樸素，可以看出它是早期的《壇經》，其中為後人附加的成份較少。人們由此得到啟發，《壇經》不祇有一種本子，宗寶本《壇經》不足以反映慧能的思想 and 南宗開創時的真實情況。此後，日本學者在京都的興聖寺發現宋初乾德五年（九六七）惠昕改編的《壇經》的翻印本，後來在石川縣大乘寺、名古屋市真福寺等地也發現此類《壇經》抄本或刻本。經過對比研究，學者們認識到《壇經》有一個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是禪宗思想和歷史發展的反映。

敦煌本因為是諸本《壇經》中最早的，所以更為學術界珍視。校本很多，除《大正藏》所收矢吹慶輝的校本外，日本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在一九三四年刊行的校訂本《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森江書店版）最為流行。全書分五十七節，並加校注，撰文解說。因為原敦煌寫本字迹混亂，錯訛太多，致使現在各種校本都有缺欠，某些字句仍難以讀通。一九四三年中國史學家向達（一九〇〇—一九六六）到敦煌訪查古寫經，從當地名士任子宜收藏品中發現一冊梵夾式蝶裝本的抄經，載有四個禪宗文獻，其中有唐獨孤沛撰《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首缺）和《南宗頓教最上乘壇經》。向達在一九五〇年寫的《西征小記》（後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對此

作了介紹，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日本學者柳田聖山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禪家語錄Ⅱ·禪籍解題》（日本築摩書房版）中在介紹《敦煌本六祖壇經》時提到：「向達在《西征小記》中講敦煌地方有歸私人所有的一本，其所在不明。」此後一九八〇年柳田為《講座佛教8·敦煌佛教和禪》（大東出版社版）所寫的《總說》中又提到此事，說他曾向中國方面多位學者打聽任子宜本《壇經》的下落，但一無所獲。順便提一下，筆者在一九八二年初曾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三個月，參加過由柳田教授主持的「禪宗文獻研究班」，當時班員分工註釋宋惠洪的《禪林僧寶傳》。回國前夕，柳田教授特為我複製了向達的《西行小記》，鄭重囑託回國後打聽一下任子宜本《壇經》的去處。我此後雖多方了解，也無所獲。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我專程赴日考察日本對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情況，對諸本《壇經》及它們各自的特點作了詳細的調查。在一九八六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幾位同志參加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任繼愈主編），承蒙中國佛教協會周紹良先生提供一部完整的《壇經》照片。我仔細一看，便知即是任子宜發現並珍藏多年的那部手抄本《壇經》。照片下部都署明「敦博〇七七」，意為在敦煌縣博物館收藏的寫經中它是七七號。我當時非常高興，任子宜本《壇經》總算知道下落了！就在同年二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三輯的《敦煌縣博物館敦煌遺書目錄》中也載錄了編號〇七七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般若波羅蜜經》的目錄。研究所張新鷹同志特地為我複製了一份敦博本《壇經》，《定是

非論》等，此後我便開始了校勘和研究。其間有朋友帶着敦博本照片找筆者，希望合作研究，但此事最終未能成功。

本書在一九八六年底完成初稿，此後幾經修改和補充，才成今天這個樣子。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京召開中日第二次佛教學術會議，我作為中方代表之一發表了《中日的敦煌禪籍研究和敦博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等文獻的學術價值》（《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對敦博本《壇經》等作了介紹，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希望早日看到敦博本的發表。然而由於某種原因，一拖就是三年多。本書僅發表筆者據照片所作的敦博本《壇經》的校本，至於全部照片，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要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中可以看到。《壇經》敦博本是敦煌本的同源異抄本，它的發表可以補敦煌本的不足，為《壇經》和禪宗研究提供新的資料。

本書在編排上分三大部分：一、正編，全文發表敦博本（也可稱敦煌新本）的校寫本。二、附編，全文轉載日本鈴木大拙所校惠昕本《壇經》之一的大乘寺本《壇經》。這是國內首次發表。又發表了約著於唐建中二年（七八一）的《曹溪大師傳》以及《六祖大師緣起外紀》等文字，可作為研究禪宗和《壇經》的參考資料。三、研究編，發表筆者所著《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於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其中有些見解還很不成熟，希望引起讀者的興趣，作進一步的研究。

借此機會向已故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表示筆者的敬意。現稱做敦博本或敦煌新本的《壇經》



寫本是任子宜先生一九三五年於敦煌千佛山的上寺發現並保存的，在一九四三年向達教授到敦煌時又慨然拿出所藏讓他看。筆者也向已故向達教授表示敬意，正是向達教授首次向社會介紹任子宜本《壇經》等抄本，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最後還應特別感謝周紹良先生慷慨地把自已珍藏的敦博本照片獻出，供研究和發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向以重效率為人稱道，本書承蒙出版社領導和李劍雄同志的大力支持，得以順利出版，敝人不勝感謝。

楊曾文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